

一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本刊编辑部

2000年出版的有关抗日战争史的图书主要有:《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苏智良著,人民出版社2月出版)、《太平洋战争新论》(李玉、骆静山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2月出版)、《东史郎日记图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月出版)、《东史郎战地日记:1938.10 - 1939.9》(纪廷许、王丹丹、王键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4月出版)、《东史郎和他的诉讼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北方文艺出版社4月出版)、《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1937 - 1945)》(丁卫平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残害劳工》(张凤鸣、王敬荣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6月出版)、《巍巍中条——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杨圣清、段玉林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7月出版)、《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津田道夫著,程兆奇、刘燕翻译,香港商务印书馆6月出版)、《战争罪责——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调查》(野田正章著,朱春立、刘燕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月出版)、《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0月出版)、《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主编,学林出版社11月出版)等。

2000年举行的有关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举办的“首都抗日战争专家学者批驳日本右翼反华

逆流座谈会”(1月),美国日本侵华研究会主办的“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与《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合办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抗日战争与中国人口问题学术论坛”(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军国主义研究》课题组举办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学术讨论会”(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中日学者座谈会”(7月)、西北大学等主办的“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8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学术研讨会”(9月)等。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与战争历史的现实认识密切相关的有关日本战争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一年来依然是抗日战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这里仅据我们的眼界所及,对一年来抗日战争研究状况评述如下。

一 日军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

战争遗留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因战争造成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加害事实、受害索赔、领土争端等实际问题;一是战后至今也未得到解决的关于战争性质、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而从一年来发表的著述来看,后者明显地在研究中占据了主要地位。造成这一状况的学术因素在于,随着实际问题研究的深入必然使人们更多地对战争的性质与责任进行理论的审视;而不容忽视的政治因素则在于,为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首脑地位而着重重新塑造日本形象的右倾势力,2000年伊始,就掀起了以否定南京大屠杀罪行为代表的篡改历史的一股逆流,其后,上至日本首相,下

至右翼文人,在不同程度上施放了歪曲历史的谬论,也迫得人们不得不对战争的性质与责任进行更多的评判。

(一)先说第一个问题。日本战时罪行研究,近来明显地与战争遗留的实际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并且成为抗日战争研究的热门之一。相关的研究课题包括南京大屠杀、中国“慰安妇”、战时劳工、细菌战、化学战、战争生命财产损失等等。现择主要研究情况评介如下:

1. 南京大屠杀研究。去年1月日本右翼集会大阪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以来,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文章。除了对日本右翼的批判外,有的文章在史实考证方面取得了进展。如高兴祖、刘燕军分别利用江南水泥厂原始档案资料、《拉贝日记》及章开沅所集贝得士文献,首次披露了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伯格救助中国难民4-5万人的史实。有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独到见解。如关于由美国政府解密后译成中文的1937年1月17日的“广田电报”,其中提及南京30万中国人被日军屠杀的事情,许多人认为这是日本人披露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人数的最早统计数字,孙宅巍则提出,这份文件是转引了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特别消息”,而不是当时日本人自己的统计;尽管如此,作为西方记者的证言,这份文件仍是研究日军罪行的重要史料。

2.“慰安妇”研究。“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2000年12月)的筹备与召开,使“慰安妇”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

高兴祖:《南京大屠杀中栖霞、江宁、句容农民的苦难和德、丹友人的国际求援活动》;刘燕军:《对南京大屠杀一组史料的考订》,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孙宅巍:《“广田电报”与南京大屠杀》,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关于慰安所与“慰安妇”受害事实的调查取得了明显进展。苏智良根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近年来的调查提出,战时日军在中国的慰安所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平、天津、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和台湾。”苏智良还与其他上海学者经实地考察后提出:目前“上海一地的慰安所就达 83 个,上海可以说是世界上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城市”。程绍蟾在崇明地区新发现了一些“慰安妇”幸存者;傅家驹则查证了宝山、吴淞等地有 10 所慰安所。南京学者经盛鸿、张连红、段月萍、陈娟、刘惠恕等人,对日军在南京建立慰安所的过程、慰安所的类型和规模进行了调查,指出日军在南京先后建立了 50 - 60 个慰安所。云南学者陈祖梁调查后确认,滇西地区凡日军师团部、联队部、大队部均建立了慰安所,“慰安妇”中有大批的在当地强征的中国汉族、傣族女性,还有 12 名中国远征军女战俘。山西学者李双兵对山西日军慰安妇制度进行了考察,确认仅在孟县即有幸存“慰安妇”24 人。海南学者符和积等人目前已经查证了海南岛各地慰安所 60 多个,有上万名中国受害妇女,其中已经证实的幸存者有几十人。旅日华侨林伯耀利用天津伪特别市档案,详细论述了日军建立的“慰安妇”供应系统。台北学者介绍了台湾关于“慰安妇”的调查援助情况。日本学者林博史提出,战时马来西亚的日军“慰安妇”中,80% 是当地华侨妇女,因此他认为,中国“慰安妇”研究的视点必须扩展到东南亚地区。第二,关于“慰安妇”问题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认识。针对日本“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关于日本军队没有“从军

苏智良:《中国各地日军慰安所的调查》,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陈丽菲、苏智良:《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2 期。

慰安妇”制度、战时日本法律允许卖淫、许多国家军队同样设立慰安所等观点,步平指出,这些观点不仅是否认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因此,“慰安妇”问题研究所关注的不仅是“慰安妇”的受害事实这样的具体历史遗留问题,而且也是“如何认识战争的侵略性质,如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如何把握日本今后发展方向的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也正是因为现实中与右翼势力斗争的需要,“慰安妇”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就必须注意准确性与科学性。关于研究方法,他还提出应注意“以论代史”问题和“记实”著作的“可信度”问题,强调“无论在什么时候,‘实事求是’都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3. 劳工研究。近年来,由于二战时期受害劳工要求日本企业赔偿的诉讼活跃,劳工问题研究引起了历史工作者的重视。关于中国受害劳工数字,吴天威综合利用中国大陆与台湾、日本、美国的史料后提出这样的观点:“日本从 1931 年至 1945 年的 14 年侵华战争期间,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其总数达到 3700 万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者近千万人”。这是现在为止,学者关于中国受害劳工人数最高的估计数字,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也有人认为,这个数字还需要进一步详细论证。在战时日本役使中国劳工情况的具体研究中,与满铁相关的研究由于资料丰富显得比较突出,其中张声振的《1931 - 1937 年间满铁土建工程中使用华北民夫的基本状况》、郭洪涛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满铁铁路中国工人状况》和赵光锐的《满铁昭和制铁所

步平:《慰安妇问题与日本的战争责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2 期。

吴天威:《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迫害致死中国劳工近千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1 期。

的劳动力招募问题研究》,比较具体地阐述了相关的史事细节。

4. 细菌战研究。该项课题仍以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研究进展为明显,而其中又以史料的发掘尤其引人注目。由王选等人翻译的美国学者谢尔顿·H. 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犯罪》,被认为是近年来关于日本细菌战研究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而学界最为看重的当属它的史料价值。该书披露了大量珍稀档案史料与当事人的私人文件,不仅翔实叙述了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犯罪事实,也翔实叙述了战后美国根据自己的远东战略需要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犯罪的事实,这对于人们观察细菌战问题成为战后未能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的主要原因提供了一个视角。因此,该书英文原版与日文版出版后就有学者引用。而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则丰富了中国研究者可资利用的史料。另外,王希亮编译的《一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证言》,披露了东条英机视察七三一细菌部队、战时该部队犯罪事实及日本战败后秘密杀害“马路大”等情况;关伟、关捷的《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比较详细地对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这一分支机构来龙去脉进行了考察,是积累史料和实地调查后关于该项研究的新成果。除七三一细菌部队研究外,关于南京一六四四部队的研究也有进展,如高兴祖在《关于中国首次挖出日军细菌战部队使用活人实验受害者遗骨的研究》中,根据法医学、材料学对1998年在原南京日军一六四四部队遗址发现的尸骨的科学鉴定,以及档案文献和日本学者搜集的证言,比已往更清楚地论述了一六四四部队制

以上3篇均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1期。

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造细菌武器、进行活人实验、在浙赣地区投放细菌等罪行。与上述日军两细菌部队研究情况相比,关于北平一八五五部队、广州八六〇四部队,由于目前史料的缺乏,研究还不够深入。此外,关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人数,在浙赣湘滇都有人进行调查,目前尚不能统计出比较确切的数字。尹集钧在 2000 年 11 月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第四届学术年会的报告中提出,根据他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迄今为止可以统计出的中国受细菌战之害死亡的人数超过 70 万人,预计会达到 200 万人。这是笔者所知目前关于中国细菌战受害死亡的最高估计数字。但与其他战争伤亡调查相比,由于细菌战从实施到造成伤亡,无论是时间延续方面还是因果关系方面,都有明显的调查难度,因此该项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5. 化学战研究。赵聆实的《关于吉林敦化日遗毒弹的两个现场》一文,提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观点,即对敦化日遗毒弹数量的估计,有日本人的 70 万发之说和敦化政府的 200 万发之说,两说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前者仅以毒弹掩埋现场为依据,而避开了这一现场以外的遗存现场。他提出:“敦化日遗毒弹现场有两个成因,一是日本关东军败退前向敦化大量运来毒弹而形成的大桥一线毒弹遗存现场;二是解放后,当地政府从敦化境内搜集及将外地运抵敦化的日遗毒弹埋于敦化哈尔巴岭而形成的毒弹掩埋现场。”作者根据实地考察和文献史料,对遗存现场的形成过程和现状做了详细论述,并对敦化日遗毒弹的类型、种类及毒性,对日遗毒弹对当地居民延续至今的危害进行了分析。除敦化

廬良:《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举行第四届学术年会》,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1 期。

日遗毒弹研究外,高晓燕实地调查了黑龙江黑河地区日遗毒弹情况。

6. 战争损失研究。关于战时中国生命伤亡损失问题,米红的战时人口重建研究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利用 80 年代以来所获得的一些回顾性调查资料及被海外公认的 1935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来整理、检验、分析研究和评价一些民国时期官方和民间学术团体人口调查的统计资料,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生育率水平与死亡率等重要指标进行了研究与重建”,“用人口学方法估计出抗战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 3000 万人”。米红并非历史学者,故姜涛提出:“抗日战争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具有学术的边缘性与前沿性,有相当大的难度。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及兼容性,这对历史学科与人口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将有所补益。”关于财产损失研究,戴雄的《侵华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毁损》是个新题目。文章对日军损毁中国古建筑的主要方式进行了分类;对毁损程度进行了介绍;并统计认为,“自九一八事变以迄日本战败投降,由于侵华日军的军事进攻和肆意焚烧行为,遭日军毁坏的中国古建筑至少应在 10000 处以上”。

(二)再说第二个问题。关于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有两方面的研究应引起重视。

1. 历史观研究。大阪右翼集会引起人们警惕的并不止是颠倒历史黑白的谎言的泛滥,更主要的是它显示出军国主义观

高晓燕:《战后发生的悲剧——日军遗毒在黑河地区的伤害》,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刘兵:《“抗日战争与中国人口问题”学术论坛综述》,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在日本社会所产生影响。因此,它给历史研究者带来的课题就不仅是如何拆穿谎言,而更重要的则是如何分析支配着谎言的那种历史观。尽管军国主义史观有“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亚洲解放论”、“自由主义史观”等等多种表现形式,但它的基本内容特征(政治特征是对外实行军事霸权,对内实行专制统治;思想文化特征是信奉以弱肉强食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特征是对天皇的绝对崇拜及与此相关的天皇专制主义政体)在一百多年间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从这点来看,我们考察军国主义史观,着眼点又不能仅仅限制在早已为人所知的史观内容方面,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如果仅仅停留在针对当前右翼势力层出不穷的言论的批判方面,而没有对与此相关的历史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及其理论方面的逻辑关系的深入而系统的分析,研究就难以达到科学性与战斗性完美结合之后才可以达到的效果。”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关于军国主义史观产生、延续并在现实中发生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一年来有明显进展。如关于军国主义史观泛滥的原因,王希亮在《论8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泛滥同新保守主义的关系》一文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探讨。他指出,从70年代末开始抬头的新保守主义是日本完成经济现代化之后新的国家战略和政策主张。它与保守主义的共同特点是维护天皇制,强调传统的国家主义。“只是,保守主义把重心放到经济主义政治之上,旧的军国主义史观一时失去兜售市场。当着新保守主义把国家战略目标明确瞄准政治大国及军事大国之后,历史观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摆上前台”,“否认战争责任,否认战争罪行本身就是新保守主义的内容之一”。菊池一隆的研究涉及军国主义史

何理:《日本右翼势力研究拟议》,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观的谱系,在分析了林房雄、渡边升一、中村粲、藤冈信胜的史观之后,他结论说:“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它主要来自两股思潮。一股是由左翼转化为右翼的;另一股是由抵制‘白人军国主义’的日本国粹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原右翼思想合流而成的。”不管这种观点正确与否,都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此外,张跃斌关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演变过程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与历史观密切关联的教科书问题,因去年日本7家出版社在2002年新版教科书内容中回避了许多重要的侵略事实,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步平在《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一文中,详细地比较了1997年版和新版教科书的内容,指出在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七三一细菌部队、“侵略”一词的使用等方面,新版教科书都明显地回避和掩盖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他分析认为,修改教科书与“自由主义史观”在日本的影响有关,而“自由主义史观”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已经不是一种思潮,而是一种不是少数派的社会运动。他还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教科书的变化是日本政治倾向变动的晴雨表。”

2. 战争责任研究。这项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日本是否应该承担战争责任;二是日本是否承担了战争责任。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日本存在着两种不同认识理念的激烈斗争,并且,否认日本战争责任的呼声日渐强烈。这使得本来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并无学术意义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除了

菊池一隆:《日中战争史研究的现状及我见》,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张跃斌:《试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关于这个问题,井竿富雄在《从反“自虐史观”到反“战后民主主义”——关于“自由主义史观”运动》,有详细论述,参见《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2期。

驳斥右翼的政治观点外,还翻译介绍了日本学者的一些著述。由程兆奇、刘燕翻译的津田道夫著《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战前日本国民主流意识军国主义化,使得每个国民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的一员。作者认为,最大的战争罪犯当然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但是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日本国民也对战争负有责任。由朱春丽、刘燕翻译的野田正彰著《战争罪责——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调查》,作者通过对原日军官兵的访问调查,分析他们战时的犯罪心理是源于当时日本国民的军国主义意识。认为战时日本国民的病态心理在战后并没有得到清算和批判,这正是一些日本人不愿和不敢承认战争责任的病根。与战争罪责相关的研究,还有孙彤翻译的野视英水的论文《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围绕东西两本愿寺的“海外开放”》。作者在“从受害者意识中走出来,承认自己是加害者”的指导思想下,具体地分析了日本宗教对中国和亚洲的精神文化侵略,引人注意的是其中提及教团负责人参加政府中枢直接参预了国家侵略政策的制订,随军布教使也积极参加了攻占南京的战斗。

关于第二个问题,学界一般认为,战后日本没有承担战争责任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需要探讨的则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美国方面的原因。有人提出,由于战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建立,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和“反

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6 月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7 月出版。

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共'的考虑,认为日本是亚洲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唯一国家,因此,对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没有进行彻底清算。另外,对于同样采取“反共”立场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美国阻止其对日索赔还有另外的考虑,这正如美国对日和约首席代表杜勒斯所言:“自从对日作战胜利以来,美国已在日本投下了二十亿美元,美国不能那样继续资助日本。美国人民不能容忍那种做法,即把钱投入日本,然后让一些盟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它拿走。”其次是中国方面的原因。战后50年代和70年代,台湾当局和新中国政府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不同的只是前者具有被动性、后者具有主动性。对于前者,有人提出,1952年日台和约谈判中,日本主要利用所谓台湾当局的“主权范围”问题为赔偿设置障碍,而台湾迫于旧金山和约生效期日近,日本恢复主权后有自由选择中国何方为媾和对象的权利,为维持中国“正统政府”的虚荣,不得不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因此也有人提出,日本是利用中国的不统一逃脱了战争赔偿。关于后者,即1972年新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现在的研究一般还限制在对《中日联合声明》中“为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这一原则的解释方面。但赔偿作为承担战争责任的一种主要形式,自1874年以来被侵略中国的日本多次充分地利用过,而中国付出3500万人伤亡和6000亿美元财产损

荣维木:《谁在制造谎言——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载《求是》2000年第6期。

《顾维钧回忆录》第9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29页。

罗平汉:《中国对对日索赔到放弃赔款要求探微》,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曾景忠:《1952年台北议和中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逃脱战争赔偿》,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参见罗平汉前引文。

失的代价后却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利弊所在,应该还有很大的研究余地。

二 中国抗战各问题

除上述关于日军侵略罪行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这一热点外,关于中国抗战方面的研究,涉及军事、经济、外交、社会以及人物等方面内容的一些课题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这里仅择主要介绍如下。

(一) 军事研究。在敌后战场研究方面,丁则勤的《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引人注目。作者在该文中提出:“建国以来许多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现代史教材或专著,采取把百团大战和治安强化运动分开的写法,把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治安强化运动的背景,这样的写法是值得商榷的。”他认为:“在百团大战前夕,华北日军并非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得到,但主要是由于对中共力量认识的不足,完全未做准备,因而遭到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百团大战之后,受到强烈打击的日军“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加强伪政权与武装;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利用伪新民学会宣传反共,开展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和对华北各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中共政策的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该文的学术价值并不完全在于作者的商榷观点,也在于作者论述日本政策发生变化时引据了大量原始资料。在国民党战场的研究方面,罗玉明的《第一次南岳会议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述》,引人注意的地方仅在于文章重新提起了南岳会议之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实施问题。文章认为:“从游击战来看,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区,配置了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约20万兵力,另外在第一、第五、第九、第三战区设立了7个游击区,配置了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总计国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兵力约在50万人以上。这些游击化了的正规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极大地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基地和补给线。”虽然这些观点因缺少足够的论据而不具学术价值,但启示人们的是,在敌后地区和敌后游击战的概念界定方面,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和讨论的空间。尤其是与上述丁文对照,到底是什么武装力量起到了“牵制大量日军”和“极大地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基地和补给线”的作用,是研究者应该重视并予以回答的重要问题。

(二) 经济研究。在战时国统区经济研究方面,黄岭峻的《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与以往关于战时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制订实施与利害分析的研究不同,主要是从经济模式思想方面,探讨了在抗战相持阶段来临之际国民党关于如何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讨论之出现的原因,以及“统制”与“私有”观点之间的争论和“计划经济”赖以实现的政治条件。该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类在思想史研究范畴,但它也为人们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提供了值得重视的一条线索。王瑞成的《战时后方经济的若干关系》,探讨了战时西南经济中的三个关系:“一是围绕战时后方经济领导体制而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的经

载《怀化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济关系,这一关系带有明显的地方经济中央化和中央经济地方化的两重特征。二是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地方经济史与抗战经济史在概念与视角上存在着某些差异。三是战时经济的区域关系。由于战时经济的影响,传统的长江上游经济区经历了战时后方经济区到战后西南经济区的调整与变动。”该文还探讨了上述三个关系之间的联系。它的学术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逻辑关系的推导方面。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研究方面,李金铮的《论1938-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依据史料详细介绍了根据地农贷政策的制订、农贷的组织系统、农贷的对象与用途、农贷的利率与清偿等情况,并且对农贷的绩效与偏向做了客观分析,指出农贷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对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发生了贷款平均分散、一些贫苦农民贷款少或没有贷上、干部徇私舞弊、贷款未用于生产、贷款不及时和有贷无还等错误和偏向。该文的学术价值在于,作为专题研究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农贷情况。

除以上中国抗战经济研究,关于沦陷区日本侵华经济的研究,王真的《论日本侵华期间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值得注意。该文提出,在削弱中国国力的对华战略目标下,日本的经济战略对策包括掠夺工农业资源、破坏中国的财政金融、实行封锁和统制贸易等项内容,而这些对策的实施依靠着军事力量和各种非经济手段,最终对中国国力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该文的价值不在它所描述的史实,而在于它为沦陷区经济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视点。这正如作者所说:“以往对战时中日经济关系的研究,着重于日本

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对华经济资源的掠夺,而忽视其削弱中国国力的一面,没有把对日本的经济行为研究和战略行为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而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失。

(三) 外交研究。在对日外交方面,张皓的《1932年罗文干出长外交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罗文干与蒋介石在解决中日矛盾方面的不同主张。文章认为,罗氏代表亲英美派出任外长,在中日矛盾问题上推行诉诸国联、依靠英美的政策,与蒋介石的主张有相同的一面。但是,他又把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坚决抵抗作为依靠英美解决中日冲突的前提条件,与蒋的主张出现矛盾。在处理一二八事变时,罗要求坚决抵抗日军侵略,蒋则主张有限度的抵抗、以抵抗求和;罗主张依靠英美使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蒋则急于解决上海问题以便“剿共”。在华北问题上,罗主张依赖国联而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蒋则在国联未对日本采取有效行动时“不再指望依靠西方解决中日问题”,转而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塘沽协定》签订后,对日妥协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罗也因之去职。该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揭示了所谓亲英美派内部,在对日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金志焕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税改订的性质与日本的对策》,从1934年中日关税改订一事中,同样说明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内部对日妥协政策占了支配地位。

关于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沈予的《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提出“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双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根据三次“和平交涉”的内容,文章指出,“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同时,也指出其拒绝‘蒋汪合流’正确立场方面。”而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文章比较尖锐地提出:“近些年来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杨奎松的《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则从另外的角度提出,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许多人都相信幕后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但其一,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其二,蒋接受议和,向与内外压力有关;其三,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因此太过迁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日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企盼能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当不为过。”杨文的观点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关于战时国民政府的其他涉外活动研究,杨天石的《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和罗敏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引人注意。杨文从蒋介石在30、40年代促进在华韩国抗日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力量的团结、支持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确定先于他国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推动韩国临时政府的改组、在开罗会议上倡言保证韩国战后独立、反对国际共管与南北分割而继续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等方面,论述了蒋与国民党给予韩国独立运动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道义等方面的援助。该文引人注意的不仅是作者比较翔实的史实描述,也在于作者对于台湾史料的披露和运用。罗文同样占有大量来自台湾的史料,主要依据这些史料,作者论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援越政策经历了由秘密收容逐渐过渡到公开扶植,由局部的、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全面的、有组织的援助的全部过程。同时还分析认为,因受对法关系的影响、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分歧、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这表明,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虽然深表同情,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最终依归。这些研究前所未见,在学术上颇具新意。

除上述外,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中国外交问题研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还有吴景平的《英国与中国的法币平准基金》和任东来的《1934 - 1936 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评介。

(四) 社会研究。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研究仍然比较少见,但所见如夏明方的《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却值得人们注意。该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农村,灾荒较之战争对于人口的迁移有着更大影响。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间地质活动

载《历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载《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2 期。

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能力,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其演变过程、迁徙路线及其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另外,江沛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评析》,也是研究战时社会史的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以华北根据地为考察对象,从该地区经济结构的嬗变、政治形态的重构、裂变的文化层面等方面,阐述了政治强力推动下社会变动的历史景观。认为这一区域在战时的社会变动,“不仅具有服务抗战的直接效应,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实验场,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走向”。

(五) 人物研究。与近些年来史学界的人物研究热潮相一致,关于抗战时期的人物研究,内容涉猎也十分广泛。这里只能摘取笔者以为带有新意的人物研究评介如下。关于蒋介石的研究,黄道炫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提出了明显有别于以往的观点。文章通过对“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提出、抵抗与妥协的关系、“安内”的内涵、“安内”的方式以及“攘外”与“安内”之间重心的变化等问题的分析,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这一方针,“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党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无奈的抉择。”关于陈诚研究,于丽、田子渝的《陈诚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与湖北抗战》,利用最新披露的陈诚的《抗日战争中的武汉战役》和档案文献,从1935年修筑武汉国防要塞开始,中经武汉会战,后至鄂西抗战,论述了这一期间陈诚在湖北的主要经历和他与湖北抗战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对陈诚发起的“新湖北运动”的论述,作者比较客观地评介了陈在战时湖北经济建设方面、实现新县制方面、教育发展方面的作为,这些都对人们研究陈诚具有参考意义。另外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的是罗健的《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该文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并且通过史实展示了一位几乎被人们淡忘了的而却在西安事变中确实发生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依据两岸公开的史料和黎天才、罗章龙、吴成方等人的未刊文稿,作者论述了前共产党人、“中央非常委员会”重要成员黎天才在西安事变前后对张学良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张的“兵谏”与黎的影响有关,而张对黎也特别倚重,事变后的张杨“八项通电”,即由黎起草并最后完成,而张护送蒋回南京,黎也是知情人。另外,文章还披露了黎与中共北方特科和“北方非委”的关系,以及黎与罗章龙在西安事变前的秘密联络等情。这些,对于人们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线索。

(责任编辑:荣维木)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载《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